

# 先秦兵家非語文記號思想分析

關紹箕

## 提要：

先秦兵家與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縱橫家、雜家，均有豐富的傳播思想。本文即從服飾、環境、身體行爲、音樂、器物、嗅覺、聲調、空間、沉默、觸覺傳播、時間、視覺傳播等十二個範疇，分析六韜、司馬法、孫子、吳子、孫臏兵法、尉繚子六部古籍中的個體與總體非語文記號（傳播）思想。藉此拋磚引玉，期能開闢「傳播研究中國化」的新領域。

###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說：

兵家者，蓋出古司馬之職，王官之武備也。洪範八政，八曰師。孔子曰國者「足食足兵」，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」，明兵之重也。易曰：「古者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」，其用上矣。後世耀金爲刃，割革爲甲，器械甚備。下及湯武受命，以師克亂而濟百姓，動之以仁義，行之以禮讓，司馬法是其遺事也。自春秋至於戰國，出奇設伏，變詐之兵並作。漢興，張良、韓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。刪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。<sup>①</sup>

蕭天石則云：

兵家思想乃中國早出思想之一，班固藝文志不列於九流，蓋以其屬「武」，而非文也。然自古文武合一……諸子多言兵，儒墨非攻反戰，遁法息兵用政，所持觀念雖異，要爲國家之捍衛，社稷之安全，種族之延續，無不有類於軍事之講究，非僅爲侵伐攘奪之工具也！戰國秦漢武略之發抒，可證知先民智慧之用於治國安邦者，軍政相需，貽教後世，良非可忽，此孫吳之兵學所以不朽者焉。**②**

蕭氏又云：

據晁公武讀書志，宋神宗元豐中，以孫子、吳子、六韜、司馬法、黃石公三略、尉繚子、李衛公問對，頒行武學，號曰七書，後世多稱武經七書。馬端臨文獻通考，亦均記述。歷代兵家，世以爲法。**③**

武經七書，除李衛公問對爲唐人著作、黃石公三略係後世依託外，其餘五書皆爲先秦典籍。**④**本論文分析之先秦兵家非語文記號思想，係以六韜、司馬法、孫子、吳子、孫臏兵法、尉繚子六書爲主；撰者並將兵家視爲「軍事思想學派」(School of Military Thought)，以與其它思想學派等量齊觀。

## • 太公望的非語文記號思想 •

徐培根云：

太公姓姜名尚，字子牙，其先世在堯舜時代裏曾做過四嶽之官，封於呂，其子孫乃以呂爲姓，因此姜尚亦叫做呂尚或呂牙。太公生於殷商王朝的末紀，其生年月日史無記載；其死，據史記稱太公之卒百有餘歲。……太公目見當時紂王的暴政，較前更甚，人民的痛苦也更益加深，而走遍天下諸侯，却找不到有任何解救之方，於是乃以垂老之年，西奔西岐與周文王相見，其時正是文王從羑里之囚釋放而歸，想有所作爲的時候。孟子稱太公與伯夷，爲天下之二大老人，足見太公在中原聲望的隆高。而文王一見了太公，就說「吾太公望子久矣！」傾談之間，遂拜以爲師，稱爲太公望，相與謀議顛覆商政以解救人民疾苦之事。**⑤**

太公望是一位記號觀察家。他觀察出殷商百姓不敢誹怨，是滅殷的最佳時機**⑥**；殷商田野，野草多於稻穀，朝臣奸邪勝於忠直，正是亡國之兆**⑦**；他還從周公用「尊尊親親」治魯，斷言魯國必衰。**⑧**

在服飾方面，太公望表現了他的重行不重服思想。他說「樸其身躬，惡其衣服，語無爲以求名，言無欲以求利，此僞人也，王者謹勿近」**⑨**；又說「奇其冠帶，偉其衣服，博聞辯辭，虛論高議，以爲客套；窮居靜處，而誹時俗，此奸人也，王者謹勿寵」。**⑩**

一種人外表樸素，衣服粗陋，看似淡泊名利，實爲熱衷名利之人，政治領袖應該疏遠這類虛僞之人。另一種人，冠帶標新立異，衣服壯麗奢華，見聞廣博，辯才無礙，好議論時俗，政治領袖也不應寵信這類奸詐之人。這是太公望的觀人術。他並不認爲服裝、言談一定會反映出一個人的真貌。

他的另一段話，更顯露出人的「心貌不合」現象。他說：

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：有賢而不肖者；有溫良而爲盜者；有貌恭敬而心慢者；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，有精精而無情者；有湜湜而無誠者；有好謀而無決者；有如果敢而不能者；有慳慳而不信者；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；有詭激而有功效者；有外勇而內怯者；有肅肅而反易人者；有噶噶而反靜穀者；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，無使不遂者。天下所賤，聖人所貴；凡人不知，非有大明不見其際，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。**⑪**

在太公望所討論的十五種外貌不與中情相應的情況中，除「詭激」屬於言語，「勢虛形劣」屬於身體特徵之外，其餘十三種均與身體行為，尤其是面部表情有關。就外在所顯現的「形貌」而言，有善良、溫厚、恭敬、廉謹、精明、清明、足智多謀、果敢、誠懇、迷亂、勇敢、嚴肅、嚴厲十三種不同的表情、動作。然而就藏匿在內心的「眞貌」而言，則有不肖、盜竊、怠慢、不敬、無才、無誠、無決斷、無作爲、無信、可靠、怯懦、平易近人、沉靜忠懇十三種不同的性格或品格。一般人很難窺知其內蘊，只有耳聰目明的大智之人，方能知人。此一思想正說明了知人是如何的不易。

在政治領袖的身體行為方面，太公望則強調「王者之道，如龍首，高居而遠望，深視而審聽；示以形，隱其情。若天之高，不可極也。若淵之深，不可測也」。**⑫**

換言之，太公望認爲政治領袖應該仔細觀察部屬的眞偽，卻不能讓部屬觀察出政治領袖的心意。要達成這樣的政治效用，政治領袖就得外示莊嚴肅穆的威儀，不露喜怒憂樂的情意，使臣下望之

而生敬畏心，不敢稍懷奸邪之念。當然，太公望探討的對象是明君與奸臣，而非昏君與忠臣。用於昏君，就值得商榷了。

太公望又說：「道在不可見，事在不可聞，勝在不可知，微哉微哉。鷙鳥將擊，卑飛歛翼，猛獸相搏，弭耳俯伏，聖人將動，必有愚色」。<sup>13</sup>此處，太公望又借鷙鳥與猛獸之藏歛動作，提醒政治領袖在有所行動前，也應控制面部表情，以防敵人覺察。足見，在太公望心目中，政治領袖要防奸、防敵，都不能將喜怒愛憎之情輕易流露於面部。

在音樂方面，太公望認為「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，故三軍之衆，聞鼓聲則喜，聞金聲則怒」<sup>14</sup>，這表示，軍事將領若能與士卒共苦，則三軍士兵無不願意為他效命。倘若士兵聽到進軍的鼓聲，必然興奮之極；聽到退軍的金聲，必然憤怒之至。由此可見，鼓聲與金聲兩種進退信號是否奏效，還在於軍事將領的帶兵之道。否則縱使鼓聲再密，金聲再大，也難起作用。

太公望又說：「微妙之音，皆有外候」。武王問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太公望答道：「敵人驚動則聽之。聞枹鼓之音者，角也。見火光者，徵也。聞金鐵矛戟之音者，商也。聞人嘯呼之音者，羽也。寂寥無聲者，宮也。此五者，聲色之符也」。<sup>15</sup>太公望所謂的「五音」，即：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然而，火光為色不為音，寂寥無聲則係沉默，真正與聲音有關的只有三種：一為枹鼓之音，一為金鐵矛戟之音，一為兵士嘯呼之音。其中，只有枹鼓屬於音樂中的器樂。姑不論五音與五行之說是否迷信，至少「微妙之音，皆有外候」一語，表達了非語文記號的意義，它等於是說：凡是音樂或聲調，皆有其顯現的外在記號可尋。

音樂的另一種功能，即在整肅軍容。太公望說「凡領三軍，必有金鼓之節，所以整齊士衆者也」。<sup>16</sup>軍容要整齊劃一，就必須配合金鼓聲的節奏，否則不僅不美觀，也會影響作戰的效率，這便是所謂的「教戰」思想。

「六韜」諸章中，與軍事記號最有關係的應為「兵徵」：

武王問太公曰：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，預見勝敗之徵，爲之奈何？

太公曰：勝敗之徵，精神先見，明將察之，其效在人。謹候敵人出入進退，察其動靜，言語妖祥，士卒所告。凡三軍悅懌，士卒畏法，敬其將命；相喜以破敵，相陳以勇猛，相賢以威武，此強徵也。三軍散驚，士卒不齊；相恐以強敵，相語以不利；耳目相屬，妖言不止，衆口相惑；不畏法令，不重其將，此弱徵也。

三軍齊整，陣勢以固，深溝高壘，又有大風甚雨之利；三軍無故，旌旗前指；金鐸之聲揚以清，鼙鼓之聲宛以鳴。此得神明之助，大勝之徵也。行軍不固，旌旗亂而相遶；逆大風甚雨之利；士卒恐懼，氣絕而不屬；戎馬驚奔，兵車折軸；金鐸之聲下以濁，鼙鼓之聲濕以沫，此大敗之徵也。

凡攻城圍邑，城之氣色如死灰，城可屠。城之氣出而北，城可克。城之氣出而西，城可降。城之氣出而南，城不可拔。城之氣出而東，城不可攻。城之氣出而復入，城主逃北。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，軍必病。凡攻城圍邑，過旬不雷不雨，必亟去之，城必有大輔。此所以知可攻而攻，不可攻而止。

武王曰：善哉。⑯

徐培根對此章的評解是：

本章係論軍隊勝敗之徵兆，其效應由士兵之言行，足以觀其士氣之旺盛或衰疲；由陣營之整亂，足以觀其紀律之嚴明或鬆弛；由自然雲氣之流動，足以觀其進攻之順利或不順。在現代傳統性戰爭中，此各項原則，亦有其參考價值。⑰

武王想在未與敵軍交戰之前，就已預見勝敗之徵兆，表示他已具有「先知」的認識，只不過缺乏具體的觀察方法罷了。而太公望認為戰爭勝敗之徵兆，常顯露於外，明智的軍事領袖只要觀察得法，就能預見勝敗。則表示他不僅具有軍事觀察的智慧，尚具有豐富的軍事觀察經驗。

在太公望所提出之兵徵之中，除「言語妖祥」、「士卒所告」、「相陳以勇猛」、「相語以不利」、「妖言不止，衆口相惑」屬於言語記號外，其餘均屬於非語文記號範疇。例如：深溝高壘、大風甚雨、城之氣色如死灰，即為環境範疇；察其動靜、三軍悅懌、相喜以破敵、即屬身體行為範疇；金鐸之聲揚以清、鼙鼓之聲宛以鳴，即屬音樂範疇；旌旗前指、兵車折軸，即屬器物範疇；三軍數驚，即屬聲調範疇；城主逃北，城不可攻，即屬空間範疇。換言之，太公望所指的兵徵，至少已涵蓋了六種非語文記號在內。

太公望還探討了辨別敵壘虛實之方法：

武王問太公曰：何以知敵壘之虛實，自來自去？

太公曰：將必上知天道，下知地利，中知人事。登高下望，以觀敵之變動。望其壘，則知其

虛實。望其士卒，則知其來去。

武王曰：何以知之？太公曰：聽其鼓無音，鐸無聲；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。上無氣氛，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。敵人猝去不遠，未定而復反者，彼用其士卒太疾也。太疾則前後不相次。不相次，則行陣必亂。如此者，急出兵擊之。以少擊衆，則必敗矣。<sup>19</sup>

太公望辨別敵壘虛實之方法，是針對未派遣間諜潛入敵壘的情況下而言的。鼓鐸無聲、飛鳥不驚、上無氣氛，這三種非語文記號所代表的意義即是：營爲空營，守營之士則爲木偶人或稻草人。換言之，太公望是從音樂與環境兩種非語文記號現象加以觀察、判定的。

敵軍若倉惶而去，去不遠忽有折返之現象，乃是因爲其行動過於疾速，士兵有落伍而回營。這表示敵軍行動必然錯亂，是乘勢追擊之良機。去而折返是一種空間或領域行爲，它透露出的不尋常意義即是：敵軍隊伍錯亂。

甲軍可憑外在徵兆觀察乙軍之虛實，同樣，乙軍亦可憑外在徵兆窺出甲軍之虛實。所以，爲了使敵軍在記號觀察上發生誤判，以誘敵入甕，必須使用記號與意義相反的欺敵方法：「外亂而內整，示饑而實飽，內精而外鈍，一合一離，一緊一散，土寂若無聲」。<sup>20</sup>換言之，此種欺敵方法，必須在內整、內精、實飽的情況下方能使用，否則就有弄巧成拙的可能。

## • 司馬穰苴的非語文記號思想 •

劉仲平云：

周禮疏中說：「齊景公（在位五十八年自公元前五四七到前四九〇年）時，大夫穰苴作司馬法。」

史記司馬穰苴傳中說：「齊威王（在位三十六年自公元前三七八到前三四二年）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，而附穰苴傳中，因號司馬穰苴兵法。

漢書藝文志禮部，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，中有古司馬法百三十篇。

隋書藝文志說：「司馬法亦河間獻王所得。」隋、唐志都說：司馬法爲司馬穰苴所撰。<sup>②1</sup> 在服飾方面，司馬穰苴著重識別章的心理意義。他說「章，夏后氏以日月、尚明也。殷以虎，尚威也。周以龍，尚文也」。<sup>②2</sup>這表示，夏代在軍人前後胸上的識別章上繪以日月，目的只在容易識別而已。到了商代，轉爲虎形，就有增加軍威的作用。周代畫上龍，除了增加軍威之外，更有神秘的心理作戰功效。足見在識別章的心理功能上，商勝於夏，周又勝於商。

司馬穰苴對軍人個性或性格的觀察十分周密。他指出軍人有「不服、不信、不和、怠、疑、厭、懼、枝柱、詘、煩、肆、崩、緩，是謂戰患。驕驕、懾懾、吟曠，虞懼，事悔，是謂毀折」。<sup>②3</sup>換言之，他認爲軍人有不服從的；有失去信心的；有不與別人和協的；有怠惰不謹的；有疑惑不定的；有厭倦不振的；有懼懼不前的；有呆不不勝任的；有屈拙不能自伸的；有煩躁不安的；有肆意放縱無羈的；有神經崩潰的；有精神弛緩的。這些都是作戰進行中的禍患。在正常的軍人中，有驕傲而又放肆的；有膽小而又自怕的。有裝病曠廢任務的；有憂虞遇事自危的；有臨事不審而事後徒

自追悔的。這些都是軍毀敗毀傷折的現象。

司馬穰苴雖未使用「表情」、「動作」或「容色」這類字眼，然而，一個不服從、不與人和協、煩躁不安、神經崩潰的人，不可能不在身體行爲上顯現這些徵兆，若無這些徵兆，軍事觀察家又如何能觀察出軍事人中的敗劣之徒呢？

談到政治領袖的身體行爲，司馬穰苴則主張「容色積威」<sup>24</sup>、「假之以色」<sup>25</sup>或「示以顏色」。<sup>26</sup>這表示，元首要有容人的氣量，近人的臉色，用於勸善；要有積極的態度，莊重的威嚴，足以懲惡。換言之，在勉勵或曉諭部屬時，一定要保持和顏悅色。這是古代政治領袖或軍事首長的一種統御方法。

在器物方面，司馬穰苴認爲「物旣章，目乃明」。<sup>27</sup>因爲旗幟代表了某種軍事訊息，所以，旗幟鮮明，受令人才不致會錯其義。此一思想也蘊涵了視覺傳播的觀念。

### • 孫武的非語文記號思想 •

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：

孫子武者，齊人也，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。闔廬曰：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，可以小試勒兵乎？對曰：可。闔廬曰：可試以婦人乎？曰：可。於是許之，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。孫子分爲二隊，以王之寵姬二人，各爲隊長，皆令持戟。令人曰：汝知而心之左右手背乎？婦

人曰：知之。孫子曰：前則視心，左視左手，右視右手，後卽視背。婦人曰：諾。約束旣布，久設鐵鉞，卽三令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婦人大笑。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復三令五申，而鼓之左，婦人復大笑。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；旣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，乃欲斬左右隊長。吳王從臺上觀，見其斬愛姬，大駭。趣使使下令曰：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願勿斬也。孫子曰：臣已受命爲將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遂斬隊長二人已徇，用其次爲隊長。於是復鼓之，婦人左右前後跪起，皆中規距繩墨，無敢出聲。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：兵旣整齊，王可試下觀之，唯王所欲用之，雖赴水火猶可也。吳王曰：將軍罷休就舍，寡人不欲下觀。孫子曰：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實。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，卒以爲將，西破疆楚，入郢，北威齊晉，顯名諸侯，孫子與有力焉。<sup>28</sup>

孫武的兵法著作，名叫「孫子十三篇」，或名「孫子兵法」，簡稱「孫子」，亦稱「孫武子」。

孫武也極重視軍事記號之觀察。他說：

敵近而靜者，恃其險也。遠而挑戰者，欲人之進也。其所居易者，利也。衆樹動者，來也。衆草多障者，疑也。鳥起者，伏也。獸駭者，覆也。塵：高而銳者，車來也；卑而廣者，徒來也；散而達者，樵採也；少而往來者，營軍也。辭卑而益備者，進也。辭強而進驅者，退也。輕車先出居其側者，陣也。無約而請和者，謀也。奔走而陣兵者，期也。半進半退者

，誘也。仗而立者，飢也。汲而先飲者，渴也。見利不而進者，勞也。鳥集者，虛也。夜呼者，恐也。軍擾者，將不重也。旌旗動者，亂也。吏怒者，倦也。殺馬肉食者，軍無糧也。懸瓶不返其舍者，窮寇也。諄諄翕翕，徐與人言者，失衆也。數賞者，奢也。數罰者，困也。先暴而後畏其衆者，不精之至也。來委謝者，欲休息也。兵怒而相迎，久而不合，又不去，必謹察之。<sup>⑩</sup>

在上述三十三種軍事記號或兵徵中，除「無約而請和」、「來委謝者」較與言語記號有關外，其餘三十一種兵徵均與非語文記號有關。

「其所居易者」、「衆樹動者」、「衆草多障者」、「鳥起者」、「獸駭者」、「塵高而銳者」、「鳥集者」屬於自然環境範疇。

「辭卑而益備者」、「辭強而進驅者」、「仗而立者」、「汲而先飲者」、「軍擾者」、「吏怒者」、「先暴而後畏其衆者」屬於身體行爲範疇。

「輕車先出居其側者」、「旌旗動者」、「殺馬肉食者」、「懸瓶」屬於器物範疇。

「夜呼者」、「徐與人言者」屬於聲調範疇。

「敵近而靜者」、「遠而挑戰者」、「半進半退者」、「不返其舍者」、「久而不合，又不去」屬於空間或領域範疇。

很顯然，孫武所列三十二種兵徵，並未提及服飾與音樂。事實上，此兩種非語文記號亦能顯映敵情。

孫武強調的知勝者有五中，其中一勝便是「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」<sup>31</sup>又說「知彼知已，百戰不殆」<sup>32</sup>、「作之而知動靜之理」<sup>33</sup>、「兵非最益多，惟無武進，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」。<sup>34</sup>所謂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、知彼、知動靜之理與料敵，都含有記號觀察之意。足見記號觀察在軍事作戰中的重要性。

## • 吳起的非語文記號思想 •

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「吳起者，衛人也，好用兵嘗學於曾子」。<sup>35</sup>

傅紹傑則云：

吳子不僅爲一大軍事家，且爲一大政治家。在秦以前，作爲兵學家是與孫子並稱，作爲政治家是與商鞅並稱。商鞅在秦佐孝公變法的規模措施，與吳子在楚相悼王革新的要領在基本旨趣上極爲彷彿。因此，有人以爲吳子與商鞅很可能有師生關係，因二人均係衛人且均曾任魏也。因以後有兵法一書傳世，其政治家的聲名反而爲軍事家的聲名所掩沒了。<sup>36</sup>

吳起是一位記號觀察家。他在謁見魏文侯時，魏文侯雖然佯裝不好軍旅之事，但他卻從文侯種種備戰的非語文記號中，窺知文侯言與心違。<sup>37</sup>魏武侯懂得運用空間（席位）和器物（鋪席器皿）來宴饗有功、無功的士大夫，似乎他受了吳起的影響。<sup>38</sup>

此外，吳起對秦、楚、趙、齊、燕、韓六國的國風政情與民性民情也觀察得十分入微，連魏武

侯聽後，都深有同感。<sup>③9</sup>

在音樂、器物或視覺方面，吳起強調「鼙鼓金鐸，所以威耳；旌旗麾幟，所以威目……耳威於聲，不可不清；目威於色，不可不明」。<sup>④0</sup>在吳起的心中，鼙、鼓、金、鐸這類以聲音傳達上級號令的音樂記號，是要威懾下級的雙耳，使之服從執行；而旌、旗、麾、幟這類以彩色傳達上級號令的器物記號，是要威懾下級的雙目，使之服從執行。所以，金鼓之聲必須讓人聽得清楚，旗幟之物必須讓人看得清楚。如此，方不致在軍事行動上發生失誤。

魏武侯問吳起：「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，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，可得聞乎？」

吳起回答道：「敵人之來，蕩蕩無慮，旌旗煩亂，人馬數顧；一可擊十，必使無措。諸侯未會，君臣未和，溝壘未成，禁令未施，三軍匆匆欲前不能，欲去不敢；以半擊倍，百戰不殆。」<sup>④1</sup>

在吳起觀外知內，察進知止的八種兵徵中，除了「禁令未施」屬於語文記號範疇外，其餘七種都屬於非語文記號範疇。

「溝壘未成」屬於環境範疇。

「蕩蕩無慮」、「人馬數顧」、「君臣未和」屬於身體行爲範疇。

「旌旗煩亂」屬於器物範疇。

「三軍匆匆」有喧嘩吵鬧之意，屬於聲調範疇；當然也與言語有關。

「敵人之來」、「諸侯未會」、「欲前不能，欲去不敢」，屬於空間或領域範疇。

吳起並未論及服飾、音樂兩種與兵徵有關的非語文記號。

「吳起」裏還討論了可戰與不可戰的幾種狀況。其中，不卜而與之戰者有八種狀況不占而遽糧狀況。這些狀況並非兩軍鄰近時所顯現的徵兆，而係由敵後所獲得之具體報。所卜，由顯察隱的兵徵稍有不同，故撰者不擬贅述。

## 六、的非語文記號思想・

史記傳說：

百餘歲，有孫臏……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。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，龐涓旣王將軍，而且以爲能不及孫臏，乃陰使召孫臏。臏至，龐涓恐其賢於己，疾之其兩足而黥之，欲隱勿見。齊使者如梁，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，齊使以爲奇，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。……龐涓自知智窮兵敗，乃自剄曰：遂成豎子之名。

齊軍，虜魏太子申以歸。孫臏以此名顯天下，世傳其兵法。<sup>42</sup>

徐陵亦云「孫臏爲孫武後世子孫，其軍事思想，淵源於中國古代之傳統文化，並承受太公之影響」<sup>43</sup>，徐魏二氏又說：

一書，在班固所著漢書藝文志裏則稱爲「齊孫子」，似爲一種極爲秘密之兵法，未祇限於師徒之間，不與外人接觸。以太史公之博覽群籍，似亦未曾見到此書。

孫臏深諳記號心理，在他所討論的十種陣法之中，疏散陣與疑陣兩種陣法均含有心理作戰意義。他認為疏散陣勢的部署法，是在兵甲較少時使用。一方面要多置旌旗，示敵以兵威，一方面要使部隊間隔疏散，狀似兵多。而疑陣的位置，則要多設旌旗羽旄，金鼓號角，兵譟馬嘶，若從天降，有似地生，造成一種神出鬼沒的懸疑氣氛。<sup>45</sup>

在服飾、身體行為、音樂、器物方面，孫臏主張「賤令以采章，乘削以倫物，辯疑以旌輿，申令以金鼓，齊兵以從速」。<sup>46</sup>換言之，軍隊應以服章來區別官階高下，並在車上插裁不同旗幟用以區別兵車之類別和等級；用特殊的旗號來傳達軍中信息；以金鼓之聲發出進兵與退兵的命令；行軍時，後隊跟隨前隊的踪跡，使脚步整齊劃一。所謂「采章」，即是采色文章或五彩徽章；「乘削」，即是載旛；「旌輿」，即是旌旗；「從速」，即是踪跡。足見，軍事行動與非語文記號之密切關係。

對於將帥心理，孫臏也有其獨特之看法。他說「智不足，將兵，自侍也。勇不足，將兵，自廣也。不知道，數戰不足，將兵，幸也」。<sup>47</sup>這表示，一個人才智不足而想帶兵，這是性格自負的表現。一個人勇氣不足而想帶兵，這是性格莽撞的表現。一個人不懂戰爭之道而偏愛帶兵，這是懶惰之心的表現。換言之，他的帶兵動作或行為，可以視為他性格的一種外在顯現。這也是一種由外觀內的知人術。

孫臏也對敵軍性格作了深入的探討。他說「兵有五名：一曰威強，二曰軒驕，三曰剛至，四曰助忌，五曰重梁（柔）」。<sup>48</sup>孫臏將敵軍分成威強、高傲、剛愎、疑忌、遲重五種不同的類型。可

惜他未說明從何種徵兆或外觀記號來判斷此五種敵軍。

孫臏說「量敵計險，勝」<sup>49</sup>、又說熟知戰爭之道的人必須「外知敵之情」。<sup>50</sup>這兩句話似乎也具有記號觀察的涵義。

## • 尉繚的非語文記號思想 •

劉寅尉繚子直解有云：

尉姓，繚名，子者後人尊而稱之也。魏惠王時人。按漢書藝文志云：尉繚子二十九篇。注云：六國時人。劉向別魏云：繚爲商君學。又兵家形勢，尉繚三十一篇。今此書只有二十四篇耳。史記亦不見惠王用此人以何職。觀惠王車敗於齊，西喪地於秦，南辱於楚，其不用此人也明矣。況是時龐涓用事，嫉賢妒能，誘孫臏刖其足而黥之。恐此人一見惠王而卽去，今不可考焉。<sup>51</sup>

尉繚十分重視將領的服飾與身體行爲。因此他所謂的「疾陵之兵」，便包括「將無修容」在內。<sup>52</sup>換言之，尉繚認爲將帥若無修整的儀容，足爲兵士表率，兵士就容易淪爲暴民之兵。

尉繚又強調身爲將領應該「寬不可激而怒」<sup>53</sup>、「安靜則治，暴疾則亂」。<sup>54</sup>前者表示：軍事首長性情要寬和，不能受到刺激就輕易顯出怒容。後者則表示：軍事首長的態度安然冷靜，軍隊便容易治理；軍事首長的表情粗暴急躁，軍隊便凌亂不治。此一思想顯示軍隊首長的性格會影響軍隊

的治亂。

在器物方面，尉繚主張「貴爵富祿必稱，尊卑之體也」。<sup>55</sup>這表示，尉繚主張官吏應有上級管轄下級的尊卑體制，而尊貴的爵位與富厚的俸祿，必須與一個人的才德相稱。換言之，俸祿是反映權勢的一種器物記號，記號（名）應與它所代表的意義（實）兩相符合。

尉繚也懂得記號的心理作用。他認為軍隊在與敵兵作戰時，應該「陳之斧鉞，飾之旂章，有功必賞，犯令必死」，<sup>56</sup>這是說，軍營應該陳列出斬殺犯人的大小斧子，表示違犯軍紀的人必被斬首；也應該佩戴華麗的旂幟與勳章，表示立下戰功的人必將受賞。換言之，斧鉞成了重罰的記號，而旂章則成了重賞的記號。斧鉞不陳，旂章不飾，便無法達成傳播效果。在此三種非語文記號中，斧鉞、旂幟爲器物，勳章則爲服飾。

在聲調與空間方面，尉繚認爲敵軍「其陵犯無節，破矣，水潰雷擊三軍亂矣」。<sup>57</sup>敵軍不當來陵犯，竟然無節度的陵犯，就表示敵軍找著了對方的破綻。敵軍像水堤沖潰般的奔來，像遭雷電轟擊般的喊叫，就表示其力量足以潰亂三軍了。換言之，「陵犯無節」爲空間記號，「破矣」爲其意義；「水潰雷擊」爲空間、聲調記號，「三軍亂矣」則爲其意義。

尉繚又探討了擊鼓與空間或身體行爲的關係。他說「鼓行交鬪：則前行進爲犯難，後行進爲辱衆」。<sup>58</sup>這是說，軍隊隨鼓聲向前行進的就代表軍人有冒險犯難的精神，反之，聞鼓聲而向後方行進的就代表他們丟失了國人的顏面。在此一思想中，「前行進」、「後行進」爲記號，「犯難」、「辱衆」爲意義。

尉繚還說「矢射未交，長刃未接，前譟者謂之虛，後譟者謂之實，不譟者謂之秘。虛實者兵之體也」。<sup>59</sup>敵軍前部呼叫，是恐遭掩襲的虛張聲勢；後部呼叫，是實力所在將有行動；不呼叫則是神秘不露或有圖謀。換言之，這是空間、聲調與沉默三種非語文記號所透露的軍事意義。

⑥0 敵軍的每一行動均與心理有關。尉繚認為「分險者無戰心，挑戰者無全氣，鬪戰者無勝兵」。敵軍若是分別據險為守，則代表他們沒有決戰的心志；敵軍若想挑釁起不意戰鬪的進攻，則代表他們沒有全心作戰的氣勢；敵軍若是輕易出陣相戰，則代表他們沒有必勝的信念。從敵軍外顯的行為？就可研判他們的虛實。

在總體軍事記號觀察方面，尉繚強調「事在未兆」<sup>61</sup>、「望敵在前」<sup>62</sup>，都有重視兵徵之意。而「傷氣敗軍，曲謀敗國」<sup>63</sup>，也表示出：士氣受損，是敗軍的前兆；謀畫不正，是敗國的前兆。

## 註釋

① 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（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二年初版），頁198—199。

② 蕭天石主纂，諸子概說與書目提要（臺北：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，民國六十七年初版），頁74。

③ 同上註，頁555。

④ 李衛公問對係唐人著作，見註②，頁73。黃石公三略係後世依託，則見(1)張心澂編著，偽書通考下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十九年臺一版），頁806—808，(2)屈萬里

著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民國七十二年），頁480—481。本論文依據<sup>(2)</sup>，頁481之說，認為：三略恐係漢人偽作。其餘五書之考證，敘於各節之中。版本、注解則參閱：<sup>(1)</sup>宋本武經七書，第九函一一三冊。臺灣商務印書館。<sup>(2)</sup>周·孫武等七子撰，明·劉寅直解，武經直解，明成化丙午二十二年保定知府趙英刊本，中國子學名著集成。以下六韜、司馬法、孫子、吳子、尉繚子均同。

<sup>5</sup> 參見徐培根註譯，太公六韜今註今譯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六十八年三版），頁11—12。

<sup>6</sup> 見林品石註譯，丘氏春秋今註今譯下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四年初版），頁449—451。

<sup>7</sup> 同註<sup>5</sup>，頁81—85。

<sup>8</sup> 見賴炎元註譯，韓詩外傳今註今譯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六十八年三版），頁438。

<sup>9</sup> 文韜上賢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71，74。有關六韜之考證，可參閱<sup>(1)</sup>張著，偽書通考下冊，頁791—797。<sup>(2)</sup>周鳳王撰，六韜研究提要，見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彙編，四十九年至六十七年博士論文提要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六十九年初版），頁574—575。<sup>(3)</sup>屈著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，頁478—479。<sup>(4)</sup>鄭良樹編著，續偽書通考下冊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三年初版），頁1593—1597。<sup>(5)</sup>國史史料學（上），頁78。本論

文暫採<sup>(2)</sup>，頁 575 之說，雖爲六韜著成於戰國晚期。撰者亦認爲六韜雖係後人追述，但仍保留太公思想。

文韜上贊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 71,74—75。

龍韜選將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 114—115。

文韜上贊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 72,75。

武韜發略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 81,84。武經直解，頁 1162 「聖有將動」作「聖人將動」，本譜文據直解改之。

龍韜勵軍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 123—124。

龍韜五指。見武經直解，頁 1254—1255。

大韜教戰。見武經直解，頁 1367。

龍韜兵徵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 138—141。

同上註，頁 141。

虎韜蠻虛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 175—176。

武韜兵道。引譯文見註<sup>5</sup>，頁 99,101。

劉仲平撰，同馬法今註今譯前言，見劉仲平註譯，同馬法今註今譯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昭國七十年二版），頁 4。

司馬法天子之義。引譯文見上註，頁 43—44。有關同馬法之考證，可參閱<sup>(1)</sup>張著，鴻書

通考下冊，頁 804—806。(2)國史史料學（上），頁 78。本論文暫採(2)之說法，認為：司馬法是戰國時期軍事制度的資料。至於是司馬穰苴本人之思想抑或周公之思想，甚難考證，故本節尙非定論。

(23) 同馬法定鑑。引譯文見註(21)，頁 73—74，77。

(24) 同上註，頁 85。

(25) 同馬法定鑑，引譯文見註(21)，頁 87—88。

(26) 同馬法嚴位。引譯文見註(21)，頁 98，101。

(27) 同馬法定鑑。引譯文見註(21)，頁 80，82。

(28) 史記（下），宋慶元黃善夫刊本（臺北·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年臺五版），頁 735。

(29) 參見魏汝霖註譯，孫子今註今譯（臺北·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三年修訂一版），頁 5。

(30) 孫子行軍篇。引譯文見上註，頁 173—176。有關孫子之考證，可參閱(1)張著，偽書通考下冊，頁 794—801。(2)鄭著，續偽書通考下冊，頁 1598—1626。(3)中國哲學史史料學，頁 57—60。(4)國史史料學（上），頁 77—78。本論文暫採(4)，頁 78 之說，認為：此書為孫武作，代表春秋至戰國早期軍事思想。

(31) 孫子謀政篇。引文見註(29)，頁 101。

(32) 同上註，頁 102。

孫子虛實篇。引文見註<sup>29</sup>，頁135。

孫子行軍篇。引文見註<sup>29</sup>，頁176。

同註<sup>28</sup>，頁736。

<sup>33</sup>  
<sup>34</sup>  
<sup>35</sup>  
<sup>36</sup>  
<sup>37</sup> 傅紹傑註譯，吳子今註今譯（臺北·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年三版），頁一。  
吳子圖國篇。引文參見上註，頁41。有關吳子之考證，可參閱<sup>(1)</sup>張著，偽書通考下冊，頁801—802。<sup>(2)</sup>屈著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，頁480。<sup>(3)</sup>楊泓撰，孫臏兵法反映出的戰國時期兵器和戰術的變化，註譯部分，收錄於楊泓著，中國古兵器論叢（臺北·明文書局，民國七十二年初版），頁146。<sup>(4)</sup>國史史料學（上），頁78。本論文斬採<sup>(3)</sup>之說，認為：以吳子內容與孫臏兵法相對照，可以看出該書還不是偽書。另採<sup>(4)</sup>之說，認為：由孫子兵法和六韜之確有，推知藝文志著錄當有根據，都是代表當時軍事思想的史料。

<sup>38</sup>  
<sup>39</sup>  
<sup>40</sup>  
<sup>41</sup>  
<sup>42</sup> 吳子勵十篇。引文參見註<sup>36</sup>，頁147—148。

吳子料敵篇。引文參見註<sup>36</sup>，頁73—74。

吳子論將篇。引譯文見註<sup>36</sup>，頁119。

吳子料敵篇。引文見註<sup>36</sup>，頁83。

同註<sup>28</sup>，頁735—736。

<sup>43</sup>  
<sup>44</sup> 徐培根，魏汝霖著，孫臏兵法註釋（臺北·黎明文化公司，民國六十五年二版），頁3。  
同上註，頁11。

45 孫臏兵法下卷十陣篇。引譯文參見註<sup>43</sup>，頁132，136—137。有關孫臏兵法之考證，可參閱(1)徐魏合著，孫臏兵法註釋，頁1—13。(2)張震譯，孫臏兵法校理序，見張震澤撰，孫臏兵法校理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民國七十四年初版），頁1。(3)鄭著，續借書通考下冊，頁1627—1630。(4)中國哲學史史料學，頁59—60。(5)國史史料學（上），頁77—78。本論文斬採<sup>(2)</sup>之說，認為：孫臏兵法之文，約為孫臏弟子所述，其間似亦有孫臏自著。

46 孫臏兵法上卷宦一編。引譯文見註<sup>43</sup>，頁115—123。另參見張撰，孫臏兵法校理，頁98，103—105。

47 孫臏兵法上卷八陣篇。引譯文見註<sup>43</sup>，頁77，79。另參見張撰，孫臏兵法校理，頁64—66。

48 孫臏兵法下卷五名五恭篇。引譯文見註<sup>43</sup>，頁163—164。另參見張撰，孫臏兵法校理，頁166—168。

49 孫臏兵法上卷纂卒篇。引文見註<sup>43</sup>，頁67。

50 孫臏兵法上卷八陣篇。引文見註<sup>43</sup>，頁77。

51. 見武經直解，頁805。

52. 尉繚子攻權篇。引譯文見劉仲平註譯，尉繚子今註今譯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三年修訂初版），頁70—71。有關尉繚子之考證，可參閱(1)張著，偽書通考下冊，頁

802 — 804。②屈著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，頁488 — 489。③鄭著，續僞書通考下冊，頁1631 — 1652。④國史史料學（上），頁78。本論文斬採④之說，認為：尉繚子仍是兵書，是尉繚對梁惠王所講的兵法。臨沂銀雀山出土孫子、孫臏兩兵書時，也出土了此書殘簡六篇，證明這確也是流傳至漢代的戰國時的軍事著作。

- 尉繚子兵談論。引譯文見劉註譯，尉繚子今註今譯，頁18 — 19。
- 尉繚子兵令上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268 — 269。
- 尉繚子原官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141 — 142。
- 尉繚子兵令上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272 — 273。
- 尉繚子職權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174 — 175。
- 尉繚子經率令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201 — 203。
- 尉繚子兵令上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273 — 274。
- 尉繚子政權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77 — 78。
- 回上註，頁75 — 77。
- 尉繚子武議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129 — 130。
- 尉繚子兵敘上篇。引譯文見註53，頁261 — 263。
- 記·本文係筆者博士論文第壹篇第十一章。

